

马克思生产理论视域下数字资本主义的 四重控制及其批判

朱春艳 韩佳宁

(东北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辽宁 沈阳 110169)

摘要: 基于马克思从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理解的“大生产”概念考察数字资本主义,会发现数字资本家利用智能算法占有数据资源,形成了平台、政治、传播和生活的四重控制,不仅生产出资本主义的数字经济模式,还生产出矛盾更为激烈的数字劳资关系,以及资产阶级的新型意识形态话语霸权。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数据垄断与政治操控加深对平台、传播和生活的全方位控制,监视并把控人类隐私,宣扬新自由主义与新消费主义的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形成单向度的数字社会景观。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四重控制,需要以社会主义的劳动关系和价值观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改造,数字中国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为人类的数字文明提供了中国方案与智慧。

关键词: 数字资本主义; 数字平台; 数字殖民; 信息茧房; 数字化生存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723X(2024)2-0090-09

马克思在阐述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时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旧资本总有一天也会从头到尾地更新,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①数字资本主义就是随着大数据技术、互联网平台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普遍应用、资本从工业资本发展到数字资本后,资本主义呈现出的新型样态。美国传播政治经济学家丹·席勒(Dan Schiller)较早提出“数字资本主义”的概念,认为当前社会的显著特征是“网络正在扩大资本主义经济中的社会与文化的范围”。^②随着资本主义开始由传统的工业资本主义向数字资本主义转型,数字资本家凭借手中掌握的互联网平台和数字等资源,通过平台垄断进行数据监控谋取利益,形成信息茧房并传播新消费主义价值观,造成数字化时代生产生活方式新的异化。要准确认识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规定,

就要运用马克思生产关系批判的方法论,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的诸环节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的局限性,探索超越数字资本主义、建构公平正义的新型数字文明的可能路径。

一、生产领域的平台控制: 数字平台垄断与数据监视

物质资料的生产形成于人类的历史发展和社会交往之中,并且随着数字化的产生出现了平台数据控制的趋势。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到生产领域的研究,将人作为劳动生产的主体,以生产关系为范畴对资本主义的本质进行批判,从而为数字平台生产提供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一文中批判了经济学家将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资产阶级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独立于历史

基金项目: 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122AZX001); 东北大学陈昌曙技术哲学发展基金项目(202002)

作者简介: 朱春艳(1969—),女,山东临沂人,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
韩佳宁(1996—),女,内蒙古巴彦淖尔人,东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研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2.

② 丹·席勒.数字资本主义[M].杨立平,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2.

存在的,是天然生成的,这导致生产关系带有了诡辩的色彩,资本主义的内在被遮蔽了。然而,马克思认为生产关系是具有历史性的,需要在历史的长河中进行审视,“社会关系和生产力密切相联。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谋生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的社会”。^①由此可知,社会关系和生产力、生产关系息息相关,生产方式的改变也会推动社会关系的转变,这也开启了数字社会中平台生产研究之门。在数字化时代,数据成为了生产要素,人类运用数字技术实现对数据的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并以此改造自然,形成了数字社会。数字私有制产生了数字资本主义,数字资本家通过数据的平台生产与技术的垄断实现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马克思曾指出资本的原始积累并非如同田园诗歌般,反而是在劳动者的生产资料被剥夺的血与火的历史中产生,“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②这种分离过程,不仅存在于传统的资本主义工业生产中,也作用于数字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并在数字的平台运作中发挥到极致。数字生产以数字资本家的剥削和数字劳动者同数据生产资料的分离为基调,并在扩大规模的再生产中实现数字资本增殖。在高新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非物质劳动发展为数字劳动,而数字劳动者在平台数据生产的运作机制中被资本家所操控,基于生产领域的平台控制由此形成。

首先,生产领域的平台控制体现为数字平台垄断,资本家试图吞并全球数字市场。数字资本家利用智能算法和互联网通信技术创建平台,将数据作为生产资料,控制数字平台和数字劳工,榨取数字剩余价值。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认为数据是数字化时代生产的原材料,

并且将平台作为数据的载体,他对此指出“平台通常由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产生,并成为一种有效的途径,能独占、提取、分析和使用记录下来的日益增加的数据量。”^③平台的价值与用户数量息息相关,平台的用户数量及其使用量越多,平台的价值程度越高。互联网、区块链和云计算成为了数字资本家关于平台生产的技术手段,连接用户网络和掌握数字用户群像信息,并收集用户浏览、点赞和转发产生的“数字脚印”,形成后台数据信息库,以此进行数据贩卖等活动。数字资本家掌握雇佣和非雇佣数字劳动者的数据生产资料,以超级平台为载体实现数字平台的剥削与垄断。大卫·钱德勒(David Chandler)和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认为,“算法和数字机器正与日俱增生成、收集、存储、处理和评估大数据,并做出让人类参与经济、政治和日常生活的决策。这一发展导致数字资本主义出现了一种特定性质:大数据资本主义”。^④数字资本家对大数据的充分利用,开辟了数字资本的原始积累之路,也为剩余价值的剥夺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与运用,平台之间的竞争也愈发显著,平台与用户之间的黏性也愈发牢固。Google(谷歌)、Facebook(脸书)、Twitter(推特)等平台迅速占据数字市场,运用搜索引擎、社交媒体、视频分析等平台功能掌握用户需求,进行兴趣类内容推广,增强用户黏性,互联网成为了容纳在线搜索、移动应用商店和数字广告的主要场所。其中,谷歌的产业链不仅遍布美国,更打开了全球市场,以谷歌云计算部门为例,其投资已深入到亚洲、南美洲等多领域,并在搜索引擎市场形成了“超级平台”。谷歌于2005年以5000万美元收购Android(安卓),2011年斥资125亿美元对摩托罗拉展开收购,谷歌的市场范围不仅涉及搜索引擎领域,更拓宽到多个市场领域。不仅谷歌如此,包含亚马逊、脸书在内的多方平台生产并掌握了大量用户数据,大平台的迅速发展导致小平台无法在数字市场立足,数字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02.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822.

③ 尼克·斯尔尼塞克.平台资本主义[M].程水英,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8:49.

④ David Chandler,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Objects, Digital Subject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on Capitalism, Labour and Politics in the Age of Big Data[M]. Lond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Press, 2019: 53.

台霸权主义油然而生,平台垄断已然成为一项恶性的竞争环节。对此,2022年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CMA)针对谷歌和苹果这类超级平台公司展开反垄断调查,批判其市场主动权的控制造成经济混乱与不公平现象。平台垄断成为数字资本控制的重要手段,违背了自由、平等、公正等社会原则。

其次,数据监视也被纳入到生产领域的平台控制中,数字劳工在数字资本家的数字鹰眼监视之下被迫劳动。如今的数字资本主义不同于以往的传统工业发展模式,而是数据流的循环利用,体现了数据生产与提取的连续性。因此,数字用户作为数字劳动的主要群体在消费数据的同时也生产数据,而数字资本家则从中剥夺剩余价值,并对数字生产者展开监视,成为新型的“监视资本家”。数字资本主义的监视活动主要通过平台开展,利用平台的算法逻辑掌控用户的数字足迹,建立起以用户群像为主的数字虚拟图像景观。数字资本家通过“上帝视角”掌握用户的喜好与需求,运用“人脸识别技术”掌握其“数字指纹”,使得用户的数字信息暴露无遗,而用户却毫不自知。数据监视行为不仅针对用户本身,也对数字劳工展开技术性监控,“上下班打卡”APP的实行、公司进出的刷脸系统以及工作场地的隐形监控,使得数字工人的工作时长与生产节奏被资本家牢牢掌控,劳资矛盾进一步加剧。同时,监视资本主义蔓延到了全球各地,2007年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实施了绝密的电子监听计划即“棱镜计划”,获得了来自苹果、脸书、谷歌等平台的用户数据,通过监控系统跟踪用户的浏览历史,监控社交媒体活动,危害了全球数字安全。^①数据监视生成的本质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内在操控,体现了数据资源的剥削与对数字劳工的压迫,是数字生产方式异化的根源。数据监视造成了人类隐私泄露,网络逐渐变得透明化,数字资本的控制进一步加深。数字资本运用智能算法技术,通过网络平台掌控数据生产要素、进行数据决策、实施数字霸权,数字平台控制权垄断的同时

也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和不公正,隐私泄露问题加剧,数字化浪潮面临着危机与挑战。

二、分配领域的政治控制: 数字帝国主义与新殖民

分配的不平等成为产品私有化的主要诱因,本质在于政治权力的控制,产生了数字帝国主义的新殖民。以生产资料私有制为核心的资本主义社会,劳动者生产的成果被资本家占为己有,这与背后的政治控制息息相关。资本家掌控利益集团和产品的分配权,迫使劳动者作为异己的力量与实际劳动成果产生分离,马克思对这种现象进行了阐述:“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②劳动者无奈接受分配不均的命运,只能拥有部分劳动成果,财富的分配问题直接导致了社会的两极化发展。而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制度源于幕后的资本主义权力机制,即政治权力者对分配所有制进行把控,促使资本主义源源不断的财富积累。对此,根据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马克思揭露资本主义分配的虚假性,提出“资本—利润(企业主收入加上利息)”“土地—地租”“劳动—工资”的三位一体公式,资本家作为物质生产的指挥者,劳动者则作为物质资料的生产者,虽然此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其特有的分配制度导致大部分成果进入了资本家的腰包。而在异样的分配关系中,资本家以吸血的状态持续占有生产资料,劳动者则作为血包艰苦努力,然而换来的却是不对等的报酬。资本的运作导致这一切都被抽象化和神秘化了,马克思对此批判道:“这是一个着了魔的、颠倒的、倒立着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资本先生和土地太太,作为社会的人物,同时又直接作为单纯的物,在兴妖作怪。”^③然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在数字化时代也不例外,数字资本家根据时代特点创设了数

①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Ethics: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ume Five[M].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95.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821-822.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940.

据分工模式,将数字劳工分配到数据生产平台的各个部门,并占据核心数据资源和成果,形成主客体的颠倒与异化,数字劳动的剩余价值被资本家占为己有。学者蓝江曾指出“今天的数字资本主义研究需要在劳动—工资、资本—利息、土地—地租的公式之上加上第四项,即数据—流量。”^①数据和流量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过程中的作用不容小觑,数字资本主义也构成了新型的数字三位一体公式,即“数字资本—利息”“数字平台—流量计费”“数字劳动—工资”,数字资本家不仅掌握数据的使用权,更占据了数据的分配权。在政治权力的操控领域,数字资本家为了获得全球的数据资源垄断,开始实行数字霸权,加强数字全球化的掠夺。

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控制主要体现为数字权力的掌控与数据资源的分配,享有特权的数字资本家占据绝大部分利益,形成数字帝国主义的新型垄断方式,导致数据资源的分配不均。新兴数字帝国垄断数据资源,实施数字霸权,其特征主要为数字化、非暴力和全球化,形式以全球数据扩张为主。谷歌作为数据资源庞大的搜索引擎,入侵了全球数字搜索界面,数字服务系统遍布各区域。数字化的发展导致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的边界弱化,网络空间成为信息推广的主流场域。以苹果公司为例,在欧洲、亚洲等地开设分公司,并将其电子设备产品设置使用独家系统和软件,实现数据的垄断。数字帝国主义掌握数据的分配权,将网络优质资源占为己有,形成了数字技术壁垒。福克斯提出文化帝国主义,即“以牺牲其他群体的利益为代价,赋予一个群体的声誉、知名度和生活方式特权”。^②数字资本家利用网络平台创造意见领袖,增加数据流量的投放,把控数字政治经济体系意识形态的控制权,渗入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引领新自由主义和新消费主义思潮。其中,新自由主义作为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旨在推进私有企业的自由发展,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新自由主

义’的称谓源于其鼓吹者的主要目标——消除国家不必要的经济监督与管制,为私有公司争取更多的自由”。^③网民在“数字自由”的信息海洋中畅游,殊不知数据价值早已被资本家占为己有,数字行为被系统监视,成为数字“产消合一”的执行人,被数字资本家榨取剩余价值。福克斯认为数字劳动与传统奴隶制具有可比性,其共同之处在于,这两类工作都是无偿的并且受到高度剥削;其不同在于,传统的奴隶劳动从事的是艰苦的手工劳作,而数字劳动则是在很大程度上像游戏般娱乐的信息工作。所以,数字劳动也被称为“玩劳动”,数字劳动者在娱乐中进行数据生产和贡献价值。^④因此,网络舆论的背后是数字资本内在操控,软文化传播成为新型帝国主义的重要手段,借用平台数据的流通将资本主义思想侵入到人类潜意识之中。蓝江认为,“数字帝国主义意味着一种数字霸权兴起,它通过各种平台和APP掌控了大量的普通用户的日常数据,并将这些数据变成了庞大的数据体系”。^⑤数字资本主义垄断了数据产业,并且在网络平台推广数字帝国主义的文化,运用数据分配权力进行数字化操控,实行网络霸权主义。而分配领域的政治控制也导致了数据资源分布的不平等,贫富差距以一种新型方式出现,数字鸿沟成为了数字网络私有制的社会产物。

数字资本主义通过数字殖民展开隐形剥削与扩张,旨在全世界实行其特有的分配制度,从而实现政治控制。新型的殖民方式以掌控网络空间为主,凭借资本平台的力量对数据资源进行分配。资本家掌握用户的数字劳动财富,推广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智能劳工进行数字奴役。首先,平台作为数字殖民圈,采用数字栅栏的方式将用户的数字财产进行包围,并通过“数据—流量”的方式垄断数字市场。其次,数字资本家将平台用户的数据资料进行二次贩卖,出售受众隐私,并通过广告招商获利。由此可知,平台之间不仅存在竞争关系,更有甚者通过数字合

① 蓝江. 数据—流量、平台与数字生态——当代平台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J]. 国外理论动态, 2022 (1).

②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Ethics: Media,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Volume Five[M]. New York: Routledge, 2023: 28.

③ 丹·席勒. 数字资本主义[M]. 杨立平,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3.

④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273.

⑤ 蓝江,王欢. 从帝国到数字帝国主义——重读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J]. 求是学刊, 2019 (2).

作,即互换用户数据资源,扩大数字殖民地,从而实现数字共赢。事实上,数字殖民无法摆脱其压迫、剥削和侵略的本质,以网络化、信息化和隐蔽化展开资本主义新型掠夺,产生了时间和空间的消弭,导致殖民的成本更低、范围更广、时效更长。对此,福克斯针说道“被剥削的数字工人创造剩余价值和货币利润,‘社交媒体’上的数字劳动类似于家务劳动,因为它没有工资,主要在业余时间进行。”^①数字劳工在情感、身体、社会交往层面都受到了压迫和剥削,数字产业的发展凝聚了劳工的心血,资源分配的不合理性导致劳工的生活迈向贫困的深渊。不仅如此,包含新自由主义在内的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削弱了工人人们的反抗精神,对工人的反抗运动造成较大的精神阻碍。“有些罢工规模很大,然而工会之间意见不一,新自由主义理论已经在中产阶级消费者和股东中深入人心,这无疑削弱了各种将这一反抗活动扩大化的尝试”。^②总而言之,数字资本政权的发展体现了线上数据资源与线下劳工分配的不平等性,产生了严重的劳资矛盾冲突,同时数字劳动相关法律并不完善,数字劳工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数字帝国主义的兴起与新殖民是数字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也是分配领域政治控制的最新结果,造成了数字分配的垄断,产生的问题不容小觑,需要以批判的眼光去看待。

三、交换领域的传播控制: 数字信息茧房的内在操控

交换作为人与人、物与物之间的连接纽带,在社会的价值创造中起到重要作用,并且在数字化的发展进程中形成以信息传播为核心的非物质交换。马克思认为,“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③原始社会展现出物与物的交换,资本主义社会展现出货币与物的交换,而在数字社会则展现出虚拟货币与物的交换、数字信息传播

形成的非物质交换。马克思也肯定了交换在生产发展中的作用,他在《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一文中指出,“由于印度极端缺乏运输和交换其各种产品的工具,它的生产力陷于瘫痪状态。尽管自然资源丰富,但由于缺乏交换工具而使社会非常穷困,这种情况在印度比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要严重”。^④由此可知,无论自然资源丰富与否,想要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交换工具是必不可少的,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如此迅速开辟世界市场,便是重视了生产和交换的作用。因此,需要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认识社会的变迁,也要意识到数字社会交换产生了新形态。在数字领域,交换已经不仅仅作为生存为目的的物质交换,也被作为生活为目的的非物质交换,以数字信息为主的非物质交换主要通过传播的手段展开,打破了交换的时空限制,而这也促进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在各大平台领域渗透。数字化时期的意识形态传播主要围绕新自由主义、新消费主义等思潮,形成了数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事实上,这只不过是一场虚假的意识形态泡沫,是带有资产阶级属性的“假自由”,在非物质交换与传播的作用下无孔不入。当数字资本家运用万物互联等大数据技术促进了数字信息传播的非物质交换,由此加速了数字资本的扩张,继承了福柯的“规训社会”思想,增强了数据的全景式监视。

新媒体技术发展迅速,数字资本主义交换领域的控制,以数字信息传播为主,形成以数字信息茧房为核心的幕后控制。数字资本家开设网络虚拟空间,掌控媒介渠道,实现数字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构建数字关系网络。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指出“媒体使得人与人之间能够随时进行交流,并且所有的交流都会产生思维模式的变化,甚至可以创造新的社会制度,因此可知信息是一个三重嵌套的过程,包含认知、交流和合作”。^⑤在如此巨大的信息网络空间,数据的交换与信息的交流行为被资本家所监控。美国学

①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280.

② 丹·席勒. 数字资本主义[M]. 杨立平,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1: 78.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4.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87.

⑤ Christian Fuchs, Reading Marx in the Information Age[M].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7.

者卡斯·R. 桑斯坦(Cass R. Sunstein)? 提出了“信息茧房”概念,认为“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的通信领域……但是重大的错误就是我们舒适的代价。对于私人 and 公共机构而言,茧房可以变成可怕的梦魇”。^① 信息茧房背后是大数据算法的运用,信息分发平台通过了解用户需求,针对其喜好进行同种信息的持续输出,即根据大数据用户点击率进行专项传播,并且对信息进行过滤,用户可以通过虚拟货币购买虚拟数据产品,也可以交换彼此的数据信息,数字信息的非物质交换由此实现。广大用户获得了大数据推送的信息,而背后实际上以自身的兴趣信号作交换,并且在算法的加工之下植入了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由此,资本家掌握群众领袖心理,在视频分享、信息输送领域创造数字意见领袖,并推广隐形广告产品,引领粉丝经济的发展。当人类陷入信息茧房的漩涡之中,便会寻求思想的认同,网络大V利用数字虚拟身份煽动群众情绪,其粉丝便成为数字化时代缺乏理智的“乌合之众”,推动了数字拜物教的形成与发展。而网络大V的粉丝量、内容点击率也受到了数字资本家的掌控,并形成KPI绩效考核指标,播放量的高标准导致内容朝着娱乐化、低俗化和劣质化发展,不利于优秀文化价值观的产生与输出。数字传播区别于以往传播的直观性,向新型的软文化传播转化,以数字化潜意识为基准进行西方思想文化传播,宣扬资产阶级文化观,加强资本的内在控制。数字思想的输出与数字产品的推广以传播作为纽带,交换作为形式,实现数字商品、数字货币和数字受众的高效率对接,数据垄断成为了资本家的思想独家秀场,造成了数字物化与数字异化等问题。

在数字交换与信息传播环节控制下的人缺乏斗争性与批判性,造成个性化的丧失。网络用户通过收集定制化信息,形成“个人日报”数据,成为资本的隐性生产者,也成为数据交换互动环节的推动者,其本质是为数字资本牟利的工具人。因此,在网络社会形成了“产消合一”的现象,用户既是网络信息的消费者,也是网络信息

的生产者,更是传播者。然而,资本家对新型交换领域中数字传播的控制,衍生出的不是自由主义,而是极端主义,用户在趋同信息的影响下逐渐变得片面,并在网络上进行去身份化的“键盘侠式”发言,不利于数字媒介素养的提升,网络文化环境受到冲击。在发生意见分歧之时,由资本控制生成的思想成为主流,并形成压倒性意见,影响了大众的心理状态和意见表达。在这样的背景下,“沉默的螺旋”油然而生,用户不敢在网络上发表真实的意见,由此产生沉默。群体意见趋同导致了单向度的网络文化环境,逐渐成为资本控制的传播场所,人自身丧失了判断力和决策力,缺乏多角度思维能力。在数字资本的诱导下,人本身的斗争性丧失,在数字拜物教的思潮中迷失自我、娱乐至死,阻碍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数字资本家加强交换领域的传播控制,营造“信息茧房”网络文化环境,掌握网络话语权和用户偏好,煽动受众情绪,引导情感认同,造成了网络公信力的缺失,网络暴力现象频发,网民成为了被资本控制的数字交换与信息传播劳工。对此,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现在都使用平台来制作、发布、展示和消费社会主义的媒体和文化作品,他们在平台上公开组织事件和发起运动,在资本主义内部进行着超越资本主义的活动,为未来的数字化发展谋求一条新的道路。^②

四、消费领域的生活控制: 数字化生存与情感异化

生产和消费作为生产关系的两端影响着人的生存与生活,数字时代消费领域形成了以数字化生存与情感异化为主的生活控制,混淆了人与物的关系,导致异己的“数字拜物教”出现。随着数字技术的运用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促使生产与消费一体化,促进社会化劳动的深度发展”。^③ 人与物之间界限逐渐变得模糊,消费领域中人与商品之间的界定也愈发困难。加拿大学者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Walker Smythe) 根据信息发展过程中的现象,提出了“受众商品理论”的

① 卡斯·R. 桑斯坦. 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M]. 毕竟悦,译.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8: 8.

② Leo Panitch, Greg Albo. Beyond Digital Capitalism[M].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2020: 112.

③ 张建云. 马克思“社会化劳动”理论及其在当今数字时代的实现[J]. 学术探索, 2023, (8).

观点。^①他认为,受众的注意力成为了大众媒介的主要产品,大众传播媒介及有关机构广告等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的一个盲点,文化和传播已然成为了资本主义生产经济中的一部分,受众成为了商品,商品中包含受众,受众在消费生活等领域都受到了数字资本家的控制。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认为,无论是在脸书、推特这类分享平台还是在谷歌这类搜索平台上,用户们都是“生产性消费者”的存在。^②在数字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受众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在消费的同时也在进行数据的生产,成为了资本家获取剩余价值的主要来源。

数字资本主义的生活控制渗透到数字消费者各方面,人类社会的生存方式朝着数字化转变,并产生了数字鸿沟等时代问题。数字化的生存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大量’沉浸在涉及网络化生产的沟通和情感维度的‘非物质劳动’中,他们适应了万维网、开放源代码软件和盗版音乐带来的刺激”。^③受众开始对数字产品产生依赖,注意力转向了数字娱乐消费。以文字、图像和视频为主的数字APP成为了社交的重要手段,用户习惯用社交软件分享生活日常,好友之间通过评论的方式增加互动,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曾作为Twitter的社交爱好者发布日常内容并获得超级铁杆粉丝。数字化消费生活也蔓延到交通、教育等各领域,其中美国纽约便加强了数字化感应系统的建设,地铁、公交的乘坐需要运用手机进行感应与扫码。同时,教育学习也离不开平板、电脑等数字设备的消费,数字化运用已经嵌入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医疗保健领域,人类通过数字平台浏览全球疾病概况,并受到数字定位的追踪,接受数字医疗机器的检查。不仅如此,“作战室的设置是为了管理数据、宣传、公众反应和控制供应物资,而作为步兵的医生、护士、其他医疗和辅助人员辛劳地对付实际的或潜在的敌人,包括他们自己”。^④由此可知,数据的应用涉及到医疗的各个方面,并给人类的生活带来影响。大数据智能算法视域下的数字生活控

制变得更加猖狂,用户的数据动态受到了追踪与控制,消费行为也需要遵循数字化的准则,而无法适应数字化生存和数字消费的中老年人逐渐被边缘化,遭受到了数字技术的歧视,造成了数字贫困等社会现象。数字APP的应用功能引导人朝着数字生活迈进,而中老年人对手机、电脑的使用适应性低,反应较为迟缓,社会数字化服务窗口较少,导致了老龄化人群对数字产品的信任度和期望值有所降低,造成了数字融入等难题。智能手机的运用和平台垄断,使得老年人无法适应,从而在生活中屡屡碰壁、求助无门,同时也会产生社交障碍,产生数字无助感和数字消费薄弱感。在信息分辨方面,碎片化的数字内容中鱼龙混杂,中老年人容易受到网络诈骗与异质信息的影响,无法保障自身的数字权益,加速了社会的淘汰。数字消费领域的生活控制不仅揭示了数字资本家的数据利益至上原则,也体现出数字强势群体与数字弱势群体之间的信息鸿沟,暴露了数字消费的缺口问题,造成社会弱势群体的数字贫困。

数字资本家在消费领域的生活控制导致了数字消费者的情感异化,造成了个人判断力和认知能力的丧失,社会伦理问题频发。数字经济的进程中衍生出数字拜物教,“数字拜物教内化了数字技术资本化的政治取向,内含了数字技术调用社会资源形成宗教场域的感性逻辑,内蕴的数字资本新剥削形式深化了社会的技术性贫困”。^⑤人对数字产品的依赖性增强,并产生了认知偏差,认为数字生活无所不能、无微不至。去身份化的虚拟世界成为人逃避现实生活的场所,娱乐化的生活方式促进了人对非物质商品(游戏皮肤装备、流量购买等)的消费,并在数字生活中寻求满足感与认同感,产生数字依赖情绪,成为数字产品的附庸。同时,人设IP的塑造以及粉丝经济的发展,将人推向数字盲目崇拜,降低对数据信息的判断力。资本与娱乐的崇拜造成了价值观的缺失,“金钱至上”和“娱乐至死”社会问题削弱

① 达拉斯·W. 斯麦兹:《大众传播系统: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盲点》[J],杨嵘均,操远芃,译,《国外社会科学前沿》2021(9)。

②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280-281.

③ 尼克·迪尔-维斯福特:《赛博无产阶级:数字旋风中的全球劳动》[M],燕连福,赵莹,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20:10.

④ Leo Panitch, Greg Albo, Beyond Digital Capitalism[M],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2020: 257.

⑤ 朱春艳,王卓伦:《数字技术时代拜物教批判及扬弃》[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

了人的批判意识,加强了数字资本家有关消费领域的生活控制。同时,虚拟世界的无限满足和现实世界的挫折与压力,导致人的生存压力加大,甚至产生了“躺平”等颓废心理,丧失奋斗的热情与工作积极性。电视、网络、手机等现代媒介的运用,使人过度依赖并占据了大部分的活动时间,造成了亲情的疏远与情感的淡漠,面对面的交流转变为互持手机的沉默,亲情户外活动也被手机娱乐所替代。电子设备的过度使用降低了人在现实生活中的沟通表达能力,增加了网络情绪爆发的概率,异化的双面人格如网络中的“键盘侠”人格与现实中的“平稳”人格并存,网络媒介素养低下和社会责任感缺失问题严重。数字的去身份化造成了壁垒社交,产生的是虚假社交,许多人在网络平台畅所欲言,但却在现实生活中社交恐惧。网络滋生了许多键盘侠,网民进行随意的言语攻击,放大言语的罪恶,变得肆无忌惮,人与人之间形成了情感的缺失,“只要社交媒体平台处于私人所有者的控制之下,并作为盈利企业运营,它们就不太可能支持民主的传播组织。虚假信息的传播、公众思想的两极分化以及侵犯隐私的行为可能会继续下去”。^①正是在这种情形下,网络的负面情绪被无限放大,言语煽动变得更加容易,为社会治安增加了隐患。数字资本主义正在通过数字网络技术渗透到人的方方面面,直至生活消费环节,对人类的生活信息加以掌控并且利用,从而为资本家服务。尼古拉斯·加纳姆(Nicholas Garnham)将信息社会理论描述为意识形态,并且是“最受欢迎的合法化意识形态”,所谓有了新的信息、网络、知识或后工业社会,就否定了在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持续存在的剥削阶级关系。^②在数字景观视域下,个体化的数字生存与情感异化,彰显了数字资本主义的生活控制,受众的生活被监视,并生活在了一个透明的场域,人的隐私得不到保障,情感也产生异化,数字排斥现象成为新型网络暴力,造成了数字资源的分布不均衡。总而言之,在数字化、智能化的经济视域下,数字资本主义将剥削与压榨作用于生活领域,改变了人的消费方式,异化问题愈发严重。

五、数字资本主义四重控制的内在逻辑

数字资本主义的掠夺围绕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展开,是资本主义雇佣关系在数字化新时期的表现,并形成了平台、政治、传播和生活四重控制。而四重控制实际上只是数字资本主义外化的表现,其本质内核在于生产资料的资本掠夺,从而满足资产阶级的根本需要。资本主义体现其特有的柔韧性,率先实现数字化转型并且野心被无限放大。在数字化时代,平台是生产活动的载体,开发数据和改造自然以供人类需要,成为数据的生产与收纳场所。数字资本家利用平台生产实现原始数据积累,并对数字劳工展开平台控制,运用平台算法对数字用户进行数据追踪,采集用户个人信息,绘制群体图像,从而掌握大数据动态与静态资源。然而,作为数字优势群体的资本家对数据一流量进行垄断,大资本对小资本实行打压,造成恶性竞争、赢者通吃的现实局面。数字资本主义的政治控制涉及到分配环节,表现为数字资本家擅自利用分配权,导致数据财产的私有化。数字帝国主义的剥削与压迫打破了时空的限制,使得资本家在网络虚拟空间展开新一轮的掠夺,垄断新兴技术,实行数字霸权。政治的控制促使分配权掌握在资本家手中,并对资产阶级文化价值观进行全球输入,造成数字软暴力,引发数字恐慌与数字灾害。传播领域的内在操控将数字消费者、数字产品以及数字货币之间的纽带进行连接,打破了交换环节的时空限制。资本家建立数字信息茧房,通过创造意见领袖对“虚假自由”价值观进行推广,培养了互联网大批“乌合之众”。而在信息茧房视域下,人的思想受到侵蚀,主体性和批判性丧失,成为资本谋取利益的“产消合一”的数字劳工,成为舆论引导的二次传播者。数字资本主义的控制也涉及到消费者的数字生活领域,在交通、教育等领域进行数字赋能,增强了人对数字化生存的依赖性。社会中的人在数字消费中逐渐沉沦,形成“数字崇拜”“娱乐至上”等思想,从而削弱人的社会群体性,变成数字智能产品的附庸。电子设备的推陈出新加速了人的数字化淘汰,数字弱势群体无法得到

① Leo Panitch, Greg Albo. Beyond Digital Capitalism[M]. London: The Merlin Press 2020: 144.

② Christian Fuchs. Digital Labour and Karl Marx[M].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39.

社会保障 数字鸿沟和数字暴力问题凸显。

数字资本主义的社会活动,实际上是以平台生产作为起点,以生活消费作为终点,并将政治分配和传播交换作为活动的中间环节。在平台生产中人被客体化,数字劳工成为了生产数据—流量的工具;在生活消费中数据产物被主体化,导致人不仅在现实中受到数字机器的制约,在思想上也受到了数字拜物教的侵蚀;政治分配,是平台生产与生活消费得以流通的中介环节,数据资产阶级占据了分配权并实施控制与掠夺;传播交换渗入到个人领域,作为微观层面的中介进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数字资本主义虽然在如今标注了新的身份,但是其本质仍然是资本主义。因此对数字资本主义开展批判,也是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肯定与追求,旨在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

想要超越数字资本主义的四重控制,需要以数字社会主义的劳动关系和价值观对数字资本主义进行改造。在数字社会主义国家,劳动成果由人民共享,通过数字工具的使用达到人与数字和谐共存、人类文明因数字发展而发展。中国作为发展迅速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取得一系列数字化成果。数字基础设施呈现出跨越式发展,5G通信技术引领世界,5G移动用户数超4.5亿户,旨在实现数字网络全覆盖,数字成果惠及人民。同时,我国致力于打造数字政府,采用高效率的电子政务,采用“掌上办”“指尖办”等平台进行政务服务。在未来,需要充分把握数字化发展大势,加强数字管理,致力于数字中国的建设。同时,坚持数字为人民服务,保障数字权益,树立正确的数字价值观,培养数字化新型人才,促进数字化资源的合理利用。

The Fourfold Control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Its Criti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s Production Theory

Zhu Chunyan, Han Jianing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henyang 110169, Liaoning, China)

Abstract: Examining digital capitalism based on capitalized “production” concept understood by Marx from the four links of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exchange and consumption, we will find that digital capitalists use intelligent algorithms to occupy data resources, forming the four-fold control of platform, politics, communication and life, which not only produces the capitalist digital economic model, but also produces digital labor-capital relations with more intense contradictions, and the new ideological discourse hegemony of the bourgeoisie. Through data monopoly and political manipulation, digital capitalism deepens its all-round control over platforms, communication and life, monitors and controls human privacy, promotes the bourgeois cultural values of neoliberalism and new consumerism, and forms a one-dimensional digital social landscape. Beyond the four-fold control of digital capitalism, it is necessary to transform digital capitalism with socialist labor relations and value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digital China construction provide Chinese solutions and wisdom for human digital civilization.

Key words: digital capitalism; digital platform; digital colonization; information cocoon; digital survival

(责任编辑:李 官)